

历史唯物主义视域下新质生产力的 形成与发展探赜

刘洋, 葛通

(上海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上海 200433)

摘要: 历史唯物主义揭示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规律, 指明了新的生产力形成的动因一定是生产实践所推动的生产关系变革。中国共产党在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 不断推动我国生产关系的变革调整, 形成了我国的基本经济制度, 这又反过来推动生产力变革, 萌芽与发展了新质生产力。在生产关系的调整与变革上, 党的领导、人民中心、可持续发展、科技自立自强、高质量发展等因素分别从主体、价值、模式、创新、目标方面给予支撑。为使新质生产力朝着真正“社会生产力”方向发展, 我们必须进一步在更高水平上建立和完善党的领导, 构建劳动优先与社会取向的经济体制, 发展人与自然协同进步的新模式, 促进科技应用经济属性的积极转化, 坚持新发展理念的正创新。

关键词: 新质生产力; 新型生产关系; 历史唯物主义

中图分类号: F 12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895X(2024)05-0458-07

DOI: 10.13256/j.cnki.jusst.sse.240826428

Exploration of the 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LIU Yang, GE Tong

(School of Marxism, Shangha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Shanghai 200433, China)

Abstract: The law of contradictory movement between productivity and production relations revealed by historical materialism points out that the essential reason for the formation of new productivity must be the reform of production relations, which promoted by production practice. On the basis of developing productive forces,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has continuously promoted the transformation and adjustment of China's production relations and formed China's basic economic system, which in turn promotes the transformation of productive forces and sprouts and develops new productive forces. In the adjustment and reform of production relations, the leadership of the Party, people as the cente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self-relianc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and other factors support the development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from the aspects of subject, value, mode, innovation and goal. In order to make the new productivity develop in the direction of real "social productivity", we must further establish and improve the Party's leadership at a higher level, build an economic system with

收稿日期: 2024-08-26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21FKSB007); 上海市教育科学基金项目(C2022372)

作者简介: 刘洋, 男, 教授。研究方向: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E-mail: liu.yang@sufe.edu.cn

labor priority and social orientation, develop a new model of coordinated progress between human and nature, promote the positive transformation of the economic attributes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pplication, and adhere to the correct innovation of the new development concept.

Keywords: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new-type production relation; historical materialism

2023年9月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新质生产力的重要性,国内学界对新质生产力的提出逻辑、内涵特征、时代意义以及指标体系方面进行了丰富讨论。这些研究都在理论或实践上推动了新质生产力的发展,但要进一步阐明新质生产力的发展特征、占有群体、服务对象与本质意义,必须先厘清一个前提性的问题,即新质生产力究竟何以形成,以及由此而形成的是什么。在此,我们有必要再次回到历史唯物主义,并从马克思对“资本生产力”这一具体历史形态的批判中寻找理论资源。

一、“生产力—生产关系”矛盾运动及“资本生产力”历史形态解剖

整体而言,从唯物史观的创立到《资本论》的写作,马克思对于“生产力—生产关系”原理的阐释是一种“互相印证”的关系,有机联系起诸多重点论断,最终可以抽象出“生产力—生产关系”如何在生产实践活动中展开的辩证关系和运动过程。

首先,生产力作为物质力量与人的现实活动能力的集合对生产关系具有决定性作用,并作为生产关系的“前提”或“目的”而不断转化。一方面,生产力作为物质力量呈现为生产资料的结果,是一种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不断发展的客观物质力量,“人们不能自由选择自己的生产力——这是他们的全部历史的基础,因为任何生产力都是一种既得的力量,是以往的活动的产物”^{[1]43}。另一方面,生产力作为人的现实活动能力,呈现为人类改造世界以使其符合自身生存与发展的水平。“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2]295}这就要求人们不断调整趋于陈旧的生产关系以适应新的需要,从而使生产力从具有盲目性的“物质前提”转化为内蕴主体存在的“目的”。

其次,生产关系作为一定生产力的必然形式,与生产力“共时性”存在,并在生产实践进行到特定阶段时对生产力起到“决定性的反作用”。一些庸俗经济学观点认为生产力对生产关系是一种“起

源决定”的发生学关系^[3],即在生产力条件具备以后相应生产关系才会产生。其实不然,生产实践是一个连续不断的过程,在量变与质变中不断地要求对外部形式加以革新。因此,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具体状态是由矛盾统一体的不断转化而显现出来的,二者本质上“共时性”存在并相互掣肘。“在现实的生产活动中,生产关系始终是生产力起作用的条件……也就是说,没有现实的生产关系就不可能有现实的生产力。”^[4]与此同时,马克思指出:“从直接生产者身上榨取无酬剩余劳动的独特经济形式,决定了统治和从属的关系,这种关系是直接从生产本身中生长出来的,并且又对生产发生决定性的反作用。”^{[5]894}因此,生产力对生产关系不是“绝对决定”,而是一种“辩证决定”。

最后,“生产力—生产关系”矛盾运动内含着革命的历史原动力,在生产实践中人们会打开一个可能性空间,这既是革命主体能动性展现的“策源地”,也是新的文明形态的生长点。黑格尔把人类社会及文明发展的动力归结于绝对精神的自我异化与辩证复归,并将其抽象为“自为之有”:“质的有在自为之有中完成;它是无限的有。”^{[6]158}但对社会历史的理解绝不能困囿于纯粹思辨,而应当从人民群众的物质生产实践中寻找答案。人民群众时刻都在创造历史条件,又时刻被所创造的历史条件所制约,这便是社会历史主体“剧中人—剧作者”的辩证法,而只有当人们意识到这种历史进展的客观规律,才能够自觉把握历史。马克思说:“我们判断这样一个变革时代也不能以它的意识为根据,相反,这个意识必须从物质生活的矛盾中,从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现存冲突中去解释。”^{[7]592}所以,共产主义革命可以说是先进阶级在生产实践过程中感知到物质冲突,并进而意识到变革生产关系、满足新的社会需求之必要性的运动。同时,由于这种运动深刻关联于所处社会的历史文化基因与革命阶级的活动路径,因而具有极强的内在张力,恰好赋予了人们一定的自为空间以选择本国、本民族的发展道路。所以说,“生产力—生产关系”在生产实践中的矛盾运动构造了一个社会“现实—可

能”相互转化的内在性质,人们在发挥革命能动性对生产关系加以主动塑造后,得以开拓出一定的发展模式,最终建构出具有特殊性的文明形态。

可见,“生产力—生产关系”的辩证关系与矛盾运动,指明了新的生产力的形成动力便是在生产实践过程中对一定生产关系所进行的变革。而在成功建构起以这一原理为基础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大厦后,马克思展开了对“生产力—生产关系”具体历史形态的批判,即“资本生产力”的批判。在马克思看来,资本是从封建生产关系中孕育出来的、与现代生产力相适应的现代生产关系。资本价值增殖的本性,以及其内在要求的自由竞争、与自由竞争相适应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相较于分散的、割据的封建体系更有利于释放此时生产力的能量。在生产力依托资本形式不断发展的同时,资本又将生产力作为自身进化与普遍化的工具和手段。“资本创造相对剩余价值、提高生产力和增加产品数量的各种手段,都是劳动的社会形式,但是它们相反表现为资本的社会形式,表现为资本本身在生产内部的存在形式。”^{[8]355}这种将过去劳动转化为资本、又将进行着的劳动不断积累为新的资本力量的生产方式,使现代生产力变成了为资本服务的“资本生产力”。

“资本生产力”曾在历史上发挥过十分革命的作用,它用理性丈量世界,并从生产与交换的变革出发,将科学技术与商品生产紧密结合起来,把一切目之所及的自然世界尽可能地转化为资本所需要的社会价值,从而完成了对一切可被纳入自身的质料的占有。然而,马克思的批判牢牢地建立在事物“不死的死”的辩证规律之上——揭示“资本生产力”这一历史形态在生产实践中内在矛盾的展开与自我破裂的宿命。马克思指出,“资本生产力”根本性的矛盾在于:代表生产力的社会化大生产与代表生产关系的资本主义私有制二者之间存在矛盾。从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来看,生产力越是不可遏制地急剧提高,社会总体生产与消费就愈加难以达成平衡。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要求攫取价值,这迫使与价值共生的使用价值不断产出,但是,使用价值却无法被社会消费所消化,最终只能被抛出资本主义体系。“资本主义社会的症结恰恰不是同一性,而是非同一性本身:它不是抽象的贫乏,而是畸形的过剩;不是应该存在的东西不存在,而是不应该存在的东西存在得太多了。”^[9]这不仅应用于一切产品,也同时应用于作为劳动力商品存在的人。随着

“资本生产力”的发展,资本家所需要追加的不变资本在总资本中的比例呈指数扩大,随之可变资本的比例却呈指数缩小,即支付给工人的工资部分会相对越来越小。“事实是,资本主义积累不断地并且同它的能力和规模成比例地生产出相对的,即超过资本增殖的平均需要的,因而是过剩的或追加的工人人口。”^{[10]726}所以,“资本生产力”的突出特征,就是生产与消费断裂的常态化,以生产过剩为主要表现的经济危机的常态化、劳动者贫困的常态化。与此同时,“资本生产力”内在矛盾的力量向外涌出,使其所创造的“功绩”逐渐转化为人类自我损害的条件。

“资本生产力”是具有历史性的畸形存在,在充分释放出它的进步性后,其历史归宿便是以各式各样的危机而“自我要求”解体。调整生产关系、使其与此时生产力达成良性互动,从而构成一个全新的生产力发展形态,便成了发生在生产实践中的内在要求,也是这一时期的历史任务。这种调整,并不是脱离实际的“空中楼阁”:“自我异化的扬弃同自我异化走的是同一条道路。”^{[2]182}以“资本生产力”的要求进行的生产实践,内在塑造了新型生产关系的萌芽——在资本主义私有制对于生产力的发展造成阻碍以后,生产实践中实质上已经生长出了一种更适应现阶段生产力发展的公有制的生产关系。这种公有制生产关系能够真正促进社会生产与再生产的良性循环,逐渐使“生产—消费”得到合理对接。此外,以新的“生产力—生产关系”形态进行着的生产实践,内在要求扬弃人与自然、人与科技及其相应的上层建筑的传统状态。其一,人与自然之间物质交换客观上必须愈加合理化、可持续化;其二,科学技术发展的动力与导向从单一生产端转向多样化的消费端,从纯粹而粗放的生产增长转变为对劳动者实际需求的品质升级;其三,社会要求形成一种在“生产力—生产关系”矛盾运动临界点出现时能够自为地调整生产关系、具有革命性质的上层建筑。我们可以称这种生产力形态为真正的“社会性”的生产力,是对“资本生产力”的超越。

二、当代中国新质生产力的形成动力与生发逻辑

马克思对“资本生产力”的批判,及其对未来“社会性”生产力的畅想都为我们发展社会主义生

产力提供了理论指导,可以为我们正确看待今天中国的新质生产力提供一把理论钥匙。新质生产力既是一种具体的生产力历史形态,与其“共时性”存在的一定生产关系紧密联系,也应当被判断为一种已有发展的结果和未来发展的导向。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高质量发展需要新的生产力理论来指导,而新质生产力已经在实践中形成并展示出对高质量发展的强劲推动力、支撑力,需要我们从理论上进行总结、概括,用以指导新的发展实践。”^[11]也就是说,新质生产力之所以能够被思维所把握,就在于它已经在生产实践中呈现出某种雏形,所具备的质态表现出了充分的先进性,并正处于生长阶段。而对于代表先进生产力的中国共产党来说,就是要在生产实践中不断使生产关系与这种生产力相适应,从而使其逐渐成熟。此时,如何站在马克思主义的高度来正确理解新质生产力的形成动力与生发逻辑,就成为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的思想前提。

我国一直以来在生产实践中推动生产关系变革,这是新质生产力得以形成的根本性质因。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改革开放35年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重大成就,根本原因就是我們通过不断调整生产关系激发了社会生产力发展活力,通过不断完善上层建筑适应了经济基础发展要求。”^[12]

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并依靠国家力量在“三大改造”中成功建立起了社会主义公有制。当时我们实行的还是计划经济体制,这对当时的生产力发展具有历史性作用,使我国在农业、工业、科技、医疗等领域实现了快速发展,这些物质基础的确立,使中国人民与中华民族真正意义上“站起来”。但计划经济体制管得过严过死的弊端也很快显现出来,于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解放思想、积极求变,创造性地建立起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我们建立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既肯定了资本在一定历史阶段推动生产力发展“文明性”的作用,又尽可能地“驾驭资本”^[13],使之服务于人与社会的全面发展。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资本主义社会的资本和社会主义社会的资本固然有很多不同,但资本都是要追逐利润的”,同时又强调,“遏制资本无序扩张,不是不要资本,而是要资本有序发展”^{[14][21]}。实质上,就是以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社会现实为鉴,利用在我国处于主导地位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扬弃“资本生产力”,并将

其中逐渐生成的新质生产力作为催生新的生产关系、消解资本本身的物质力量。这是基于生产实践活动中的需要对生产关系进行的革新,从而有效推动了新的生产力的发展,这同时也奠定了我国当下“新质生产力”形成的基础。

我们之所以能够在生产实践中不断调整生产关系,促进新质生产力的萌芽与发展,是拥有一定维系、承托这种变革的系统支撑。这些支撑在生产实践过程中时时刻刻发挥着作用,既是既往生产关系调整、推动新型生产关系逐步形成的条件,也是当下我国发展新质生产力的优势和路径。总的来讲,这些基本支撑分为五个方面,其中第一个方面的“政治主体支撑”作为一种主体条件统领其他四个方面,并以它们作为推动新质生产力形成的基本路径;而后四个方面互为补充。在它们的有机互动下,可以有效促进“新质生产力—新型生产关系”形态的逐渐生成与良性循环。

第一,中国共产党作为推动生产关系发生变革的“政治主体支撑”。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逻辑与我国生产力发展的历史逻辑生动地表明,社会经济的发展并非被动适应,而是一种发生在生产实践过程中、基于生产力内在需求的主动变革。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中国共产党作为政治主体,根据国家发展的实际情况与生产实践活动的具体特征,制定了一系列旨在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政策和措施,进行了自觉的、适当的、前瞻的、不同层面的社会经济调整,从而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快速发展和社会经济的全面进步。在这一过程中,其不仅注重解决当前面临的矛盾和问题,更着眼于系统谋划与长远发展,通过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推动科技创新等措施,提高了经济发展的质量和现代化水平。

第二,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支撑”。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历程,充分体现了“人民主体”的历史观,也把握住了劳动人民在生产实践过程中的基础性、根本性地位。在关注时代主题和社会主要矛盾的前提下,中国式现代化实践围绕“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价值取向,坚持把人民真实需求作为生产力的服务对象。这有效塑造了人民更为丰实的物质与精神生活,反过来促进了劳动者的劳动能力与精神觉悟,塑造了更为先进的生产实践能力和自觉变革意识,因而劳动者能够以建设国家、坚守理想为指引,主动投入劳动实践。

第三,人与自然协同的可持续发展的“模式支撑”。不同于“资本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对于自

然环境的理解只能用以资本逻辑加以嵌套,或是走向后现代主义的“左绿”。我国基于人与和谐共生的理念,在生产实践中将自然生态发展真正与人的发展融为一体,转变生态价值理解,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社会性存在”“自然性存在”的统一,以及中国哲学“道器不割、体用不二”人与自然共生的传统理念。

第四,不断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形成了“创新支撑”。科技自立自强与自力更生、自主创新一脉相承,是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内在要求。在社会主义生产力的发展道路上,我们始终坚持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在此基础上以科技创新赋能生产力进步,大幅提升了生产力发展的活力。

第五,以高质量发展作为全局性的“目标支撑”。新时代以来,在习近平经济思想的指导下,我国坚持全面深化改革,把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起来,积极构建“双循环”格局,推动经济实现从单纯量的增长转向质的跃迁,使“高质量”要求得以同时贯彻在生产实践的目标与过程中。

可以看出,在推动生产关系变革以适应生产力发展的历程中,我国形成了五个方面的系统支撑,以助推革命性的生产实践的开展。这五个方面支撑所具有的特殊性,内在包含着新型生产关系的性质,使得我国的新质生产力与“资本生产力”发展的内在机制和追求导向有着本质差异,亦决定了二者的生发逻辑会有着根本上的不同。作为实质上扬弃“私人生产力”的“社会生产力”的面貌而历史性地生长出来的新质生产力,最终要求的是“人的生产力”的提高,服务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因此它真正具备了社会属性,它体现了人与自然新的和解,人与人、人与科技之间新的结合,并为进一步推动旧的思想观念革除、催生出新的上层建筑提供基础。

三、“新质生产力—新型生产关系” 历史形态的发展路径与实践策略

要想正确认识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必然要将其与新型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的具体历史形态作为研究对象。从这种思想前提出发,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的重点,就是在把握新质生产力形成动力及其五大支撑基础之上,进一步地建构合理的发展路径和

实践策略。从而使生产力一方面作为物质结果进一步展现,另一方面内化为主体的能动力量不断充实。

第一,必须坚持党在调整生产关系、全面深化改革中的领导地位,不断提升党对“新质生产力—新型生产关系”矛盾运动规律的认识能力。发展新质生产力必须坚持作为先进生产力代表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以此作为塑造新型发展模式、构建新型生产关系的根本支撑。而在当下,生产力发展因新的历史条件而具有了前所未有的内涵、特征、表现,面对着机遇与挑战相交织的复杂环境,还需加强全党对于“新质生产力—新型生产关系”矛盾运动规律的科学认识。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历史发展有其规律,但人在其中不是完全消极被动的。只要把握住历史发展规律和大势,抓住历史变革时机,顺势而为,奋发有为,我们就能够更好前进。”^{[14][5]10}因此,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科学研究方法,深刻理解“生产力—生产关系”矛盾运动在我国的具体形式。除此以外,内蕴着质态跃迁的新质生产力必然要求经济基础发生整体性的调整与完善,关联的是整个社会的再生产活动。所以,分析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反作用,往往要关注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的全过程及其相互作用,并考察这四个环节如何制约着生产力的发展。若发现了其中的痛点、堵点,就必须充分发挥我国的制度优势,尤其是发挥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显著优势,围绕国家的战略需求,优化配置创新资源,最终在诸多重要领域形成新的发展优势,创造新的历史主动。

第二,必须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公平方面,提升劳动地位,塑造符合数智化时代的新型劳动正义,加强生产的“社会取向”。新质生产力本质上是一种与劳动重新组合并以劳动为中心的生产力形态,是真正的“社会生产力”。在公有制为基础的更高水平的劳动既是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原因,也是新质生产力发展的结果。随着新质生产力催生高质量的产品、设施、服务,劳动者的消费质量将会得到质的提升,其智力、情感、肉体也会因此得到质的发展,进而为形成高质量的人才队伍提供了基础,这为促成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了契机。因此,要从源头和结果双重导向出发,不仅从根本上进一步加强劳动者在生产发展上的主动权、支配权、优先权,还要着力于实现新质生产力发展成果的共享,形成劳动者更高水平的消费能力。我们要在坚持公有制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

市场经济体制的公平方面,并以制度为支撑,一方面,努力突破传统“人口红利观”,引导全社会接纳更加符合新质生产力发展的“人才价值观”或“人才实现观”,调动劳动者真正热爱并崇尚劳动的“主体动力源”,使其正向反哺于企业成长、产业升级。另一方面,引导社会生产朝着为民服务、与民共享的方向发展,逐步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使劳动者更充分地占有劳动成果,进而转化为高质量的消费者,形成“劳动—消费”的良性循环。

第三,必须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转换利用自然的方式方法,形成绿色健康的生产力、生态安全的生产力、自然审美的生产力。新质生产力作为一种可持续发展的生产力质态,是人与自然关系发生重大变革的集中展现,也必然形成更高质量的人与自然的互动方式,形成辩证超越“杰文斯悖论”的历史趋势。随着新质生产力的发展,一方面,客观上人们利用自然的效率和效果显著提升,具备了构建亲生态、亲资源的新型生产关系的客观基础;另一方面社会整体文明程度的提升,会逐渐要求摒弃以增量为根本逻辑的发展方式,于是产品增值将愈加与人的健康、审美、享受等高级需求挂钩。所以,必须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这一转换利用自然方式的理论指引,并且要在宏观、中观、微观层面协同发力,塑造绿色健康的生产力、生态安全的生产力、自然审美的生产力。在宏观层面加强国家对资源利用的统筹规划,在中观层面提升新能源、新材料、新技术相关企业的市场占有率,在微观层面,加强社会、学校、家庭的一体化生态教育。

第四,必须正确处理科技应用,转变科技传统的“经济属性”,使科技发展成为促进美好生活的正向力量。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科技创新能够催生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素。”同时又强调:“要及时将科技创新成果应用到具体产业和产业链上,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布局建设未来产业,完善现代化产业体系。”^[1]这表明,推动科技研发必须关注其所应用的方向。今天中国的新质生产力,历史性地要求扬弃科技旧有“经济属性”,解决资本有机构成不断提高与劳动者生活条件不断下降这一“技术—劳动”互斥悖论,并将科技应用与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结合起来。这要求我们一方面出台相应的科技伦理法律法规,密切关注科技与

私人资本的结合,强化科技垄断监管,推动网络空间共享、数据利用透明、创新竞争公平、最新成果普及;另一方面,利用最新科学管理模式促使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的优化组合,提高科技人才劳动报酬,并且提升科技的民生属性,从而塑造科技发展背后新的经济动力,使科技创新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不断生发。

第五,必须坚持新发展理念,同时在具体领域开展对新发展理念的进一步应用与创新。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质生产力是“符合新发展理念的先进生产力质态”^[1]。实际上包含了两层涵义:一方面,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在正确贯彻新发展理念的基础上逐渐形成了新质生产力的萌芽;另一方面,新发展理念依然是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思想理论上的必要条件。因此,贯彻新发展理念将长期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思想指引。马克思指出:“任何新的生产力,只要它不是迄今已知的生产力单纯的量的扩大(例如,开垦土地),都会引起分工的进一步发展。”^{[10][20]}分工的发展必然带来全新的社会风尚与社会思潮,最终引起社会整体面貌的重塑,这就是“新质生产力—新型生产关系”新的历史形态运动。鉴于此,必须围绕经济社会发展的全局统筹贯彻、坚决落实新发展理念的各个方面,充分发挥新发展理念中调整生产关系的革命因素,以应对其中伴随着的新风险与新挑战。此外,新发展理念的具体运用并不能携带主观主义倾向,而是要着重加强辩证思维能力、战略思维能力、底线思维能力,结合某一社会经济领域的实际生产力状态进行守正创新,例如,塑造符合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新人才观、新金融观、新教育观、新知识观乃至新文艺观等。

四、结语

新质生产力特点是创新,关键在质优,本质是先进生产力。在生产实践中所推动的生产关系变革,是人类社会实践中最为基础性和根本性的创新,新质生产力从这其中悄然萌发并蓬勃生长。然而,若要积极从“必然王国”逐步走向“自由王国”,创新就必然守正,实践就必然站在原则高度——这既是一种思维方法,也是一种道路抉择。因此,我国发展新质生产力作为一项长期任务和系统工程,其中的要害就在于把握新质生产力的“新”,集中体现在它作为一种新的生产力发展形态与“新型生产

关系”构成一种全新矛盾运动,成为一种真正的“社会性”生产力发展模式。从此出发,发展新质生产力既要始终保持历史耐心,方法得当、防止走偏,又要有时不我待的紧迫感与责任感;既要系统谋划、整体推进,又要从主体、价值、模式、创新、目标等多方面加以主动塑造,最终使生产力发展成为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正向促进力量。

参考文献:

- [1]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2]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3] 王峰明.对生产力一元决定论的反思与新释[J].马克思主义研究,2012(10):81-95.
- [4] 马文保,刘曦.重新理解马克思的生产关系思想[J].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5):119-124;133.
- [5]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6] 黑格尔.逻辑学(上卷)[M].杨一之,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
- [7]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8]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
- [9] 牛子牛.资本逻辑下劳动主体性的再生产——西方马克思主义资本批判理论的一个当代面向[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23(6):178-186.
- [10]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11] 习近平.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 扎实推进高质量发展[N].人民日报,2024-02-02(001).
- [12] 习近平.坚持历史唯物主义 不断开辟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发展新境界[J].求是,2020(2):4-11.
- [13] 郗戈.“驾驭资本”与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思考[J].中国社会科学,2023(12):4-18.
- [14] 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4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22.

(责编:程爱婕)